

日澳安全关系探析

屈彩云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102)

摘要: 日澳安全关系贯穿于双方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交往之中。期间, 日澳演绎了间接盟友、敌对、伙伴、同盟等安全关系范式。20世纪末, 在日澳双边关系中日益凸显的安全关系, 不仅是双方强化的重点, 也是亚太安全体系的焦点。当今, 日澳对双边安全关系模式的构建, 既反映了日澳安全战略的发展动向, 也触发了亚太安全格局的微妙变化。本文从纵向的视角来分析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演变, 揭示其本质特点, 探讨其目前面临的挑战和今后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 日澳; 安全关系; 间接盟友; 敌对关系; 同盟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1)02-0049-09

日澳安全关系纵贯双边关系史发展的一个多世纪。期间, 日澳安全关系时隐时现, 经历了不同范式的转变。“二战”以来, 处于冷却状态的日澳安全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逐渐升温, 并有愈演愈烈之势。21世纪, 日澳军事同盟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 引起世界尤其亚洲周边国家的关注, 给亚太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增添玄机。日澳安全关系的走向影响亚太安全格局的变动。本文拟从纵向的视角追踪溯源, 剖析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演变, 揭示其本质特点, 探讨其目前面临的挑战和今后发展的方向。

一、日澳安全关系范式的演变

地处太平洋南北两端的澳大利亚和日本在18世纪下半叶仅有一定贸易往来。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世界格局发生变动, 列强对世界的瓜分与掠夺, 拉近了日澳的距离。日澳在先于双边经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首先确立安全关系。迄今为止, 日澳安全关系经历了间接盟友、敌对、伙伴、同盟等范式的演变。

1.1 英日同盟中的防卫与防范关系

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 派生出日澳间接盟友的安全关系范式。一方面是日本对澳大利亚的防卫和保护。1901年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其对外关系和防务由英国政府负责。^①《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使日本承担起对澳大利亚安全的防卫。当时的媒体评论说“这个与日本的防卫性条约, 不仅会保护澳大利亚联邦的北部领土, 也会保障澳大利亚在远东的长期贸易利益。”^②日本舰队分别于1903、1906年两次访问澳大利亚。1907年,

收稿日期: 2010-09-24; 修订日期: 2011-01-20。

作者简介: 屈彩云(1976—), 女, 山西大同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

① 刘樊德著《澳大利亚东亚政策的演变》,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版, 第19页。

② 澳大利亚《悉尼晨锋报》对媒体和政界谈论英日同盟给澳大利亚带来的好处所做的总结。引自[澳大利亚]大卫·沃克著, 张勇先译:《澳大利亚与亚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91页。

英国将澳大利亚的海军防卫权交给日本。^①“一战”期间,日本巡洋舰曾护送载有第一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志愿者的船队穿越印度洋开赴埃及,而且日本战舰曾巡逻澳大利亚海岸。^②另一方面是澳大利亚对日本的防范和戒备。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令澳大利亚的恐惧与日俱增,甚而因担心日本移民冲击其笃信的“白澳政策”,澳大利亚拒绝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虽然有英日同盟这一庇护伞,但澳大利亚对日本戒心十足,视日本为潜在的和可能的敌人。许多澳大利亚领导人认为,英日同盟使澳大利亚更脆弱。^③对于英国支持日本成为太平洋的海上强国,澳大利亚则持警惕的态度,并加强对本土防卫,改善安全处境。1906年,澳大利亚实现了对英属几内亚的行政管理,为本土安全提供缓冲地带。1907年,澳大利亚成立了国防委员会,着手组建海军和澳大利亚人军队。澳大利亚甚至不惜激怒日本,邀请美国“大白舰队”成功访澳。在继续巩固与英国的联邦关系的同时,澳大利亚寻找机会接近美国缓解自身危机。1921年,英日同盟解体,日澳安全关系范式改变。

1.2 日本的扩张与澳大利亚的防范

“一战”后,澳大利亚以日本为潜在威胁渐生不对称的日澳安全关系。一方面是日本的扩张与征服,已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形成间接威胁。20世纪20—40年代,日本继续奉行向外扩张路线,并最终发动所谓构建“大东亚新秩序”的侵略战争。如果说日本“北上”侵略令澳大利亚忧心忡忡,那么日本的“南下”侵略则令澳大利亚寝食难安。拥有丰富资源的澳大利亚也被列入日本的“待征服地区”名单。^④日本对澳大利亚的威胁正步步紧逼。尽管此期间日澳经贸关系发展平稳,但并不能改变双方安全上紧张而又微妙的态势。另一方面是澳大利亚对日本的积极防范和绥靖政策。抵御日本南下侵略是澳大利亚安全战略首先考虑的目标。澳大利亚积极支持英国在新加坡的防御工事。在依赖英联邦的保护之外,澳大利亚加强了本国军备建设。

布鲁斯政府时期建造了大量军舰,成立空军,巩固国防;来昂斯政府提出重整军备计划,提议签订《太平洋非战公约》。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以经贸纽带和外交斡旋来缓解或改变自己的安全困境。1938年,澳大利亚禁止对日本出口铁矿石;1940年,澳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澳大利亚试图寻求美国的保护;同年,澳大利亚正式派遣驻日大使,继而派部队进驻马来西亚。然而,澳大利亚的防范举措无济于事,日本南下侵略一路挺进,澳大利亚的安全岌岌可危。

1.3 日澳敌对关系

“二战”爆发,日本已是澳大利亚安全上的首要威胁,但是澳大利亚政府仍犹豫不决。然而,随着东南亚各国和太平洋大部分岛屿相继被日本占领,澳大利亚面临的威胁已迫在眉睫,保护本土安全刻不容缓。“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澳大利亚对日本宣战,签署《华盛顿宣言》,加入反法西斯世界同盟。柯尔廷总理呼吁盟国对日本侵略行径做出强烈反应。^⑤至此,日澳安全关系已变为进攻与反击、侵略与反侵略的敌对关系。日机轰炸达尔文,日潜艇袭击悉尼等港口,澳大利亚境内战火纷飞,日澳兵戎相见。1942年,澳美结成战时同盟,联手抗日,在几内亚挫败日本开启澳大利亚国门的行动,在珊瑚海战役中一举击败日军。随着日本法西斯同盟的溃败,日本对澳大利亚的直接威胁已是灰飞烟灭。战后,澳大利亚视日本为敌对国家,提议对日本实行强硬制裁,削弱日本,防止其东山再起,以免对自己再造成威胁。澳大利亚外长伊万特主张从严解决日本问题,必须要审判并惩罚日本战犯(甚至包括日本天皇),以确保东亚、

① [澳大利亚]大卫·沃克著,张勇先译《澳大利亚与亚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② Peter Stanley, *Invading Australia - Japan and the Battle for Australia*, 1942, the Penguin Group, 2008, p. 35.

③ Ibid, p. 28.

④ Manning Clark, *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 America New library Press, 1980, p. 233.

⑤ 汪诗明著《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安全。^①

1.4 美国主导的间接盟友

“二战”后,美国因素和冷战格局催生出新型日澳安全关系范式。日澳转变为美国主导下的间接盟友。在冷战格局中,美国视日本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和“防波堤”,希望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太平洋南北间遥相呼应,共同遏制共产主义。澳大利亚主张削弱日本的想法落空。在美国的压力下,澳大利亚无奈与日本签订“软和平条约”。^②但澳大利亚对日本的仇隙仍未冰释,拒绝与日本建立直接同盟。^③1951年,《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美澳新安全条约》的签订确立了日澳间接盟友关系。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盟友,日澳在周边安全及地区安全框架等问题上,进行了沟通与合作。澳大利亚视日本为获取关于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政治情报的来源地。随着日澳双边关系的迅速提高,到1965年,澳大利亚自太平洋战争后对日本的普遍仇恨和怀疑在堪培拉的政策考虑中已表现出明显的转变。^④1976年日澳冰释前嫌,签订《友好合作基本条约》,走向和解。可以说《友好合作基本条约》比澳大利亚当时所签订的任何其他条约更全面,比日本与其他国家所签订的商业、航海条约更广泛,^⑤这为日澳安全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的鼓动下,日澳之间确凿的安全合作秘密开始,主要是限于情报交流。^⑥1990年3月,澳大利亚国防部副部长保罗·迪布访日,就提高防卫关系和建立平等制度以推进防卫对话等问题与日方进行协商。同年5月,日本防卫厅长官石川要三对澳大利亚进行回访,标志着两国正式在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1.5 日澳安全伙伴关系

冷战后,构建日澳安全伙伴关系被提上日程,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加强双边安全对话。1995年日澳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建立为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框架。双方将地区安全和防务合作纳入两国“伙伴关系之中”。^⑦1996年2月,日澳举行首次“政治与军事对话”会议,确定年度磋商机制。2001年4月的《日澳

建设性伙伴关系悉尼声明》、2002年5月的《日澳新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及2003年9月《日澳防卫交流理解备忘录》的都在强调深化双方安全与防务的合作与对话。澳国防部长希尔说“备忘录暗示着双边防务与安全关系的日益加强。它也表明日澳双方对安全合作越来越重视。”^⑧2006年3月,日澳提出发展两国全面战略关系,日澳安全合作逐渐升级。二是加强反恐中的安全合作,日澳共同应对东帝汶危机。2001年后期,日本决定对东帝汶采取的维和行动为东京和堪培拉之间建立紧密的防务联系提供了机会。^⑨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更为日澳之间的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2003年7月,日澳两国签署《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联合声明》。2005年澳大利亚派遣450名皇家军队人员,特别为在伊拉克重建中的日本自卫队提供

① Russel Ward, *A Nation for Continent —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Heinemann Education Australia, 1981, p. 285. 引自宋效峰、张立华“澳日关系之世纪变迁:由地缘敌手到合作伙伴”,《学术探索》,2006年第4期,第83页。

② R. N. Rosecrance, *Australian Diplomacy and Japan, 1945 — 1951*,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57.

③ 1951年,美国提议由美、澳、新、日等五国共同缔结同盟条约,因澳大利亚坚决反对日本参加这一安全体系,最终签订了排除澳日建立直接同盟关系的《美澳新安全条约》。

④ David Walton, “Australia — Japan and The Region, 1952 — 65: The beginnings of security policy networks”, in Brad Williams and Andrew Newman, *Japan, Australia and Asia — Pacific secur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9.

⑤ Moreen Dee, “Friendship and Co — Operation: the 1976 Basic Treaty Between Australia and Japan”, *Australia in the World*, the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Files/No. 3, p. 44.

⑥ Desmond Ball,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Australia Current Ele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Brad Williams and Andrew Newman, *Japan, Australia and Asia — Pacific Secur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64.

⑦ Alan Rix, *Australia — Japan Political Alignment: 1952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40.

⑧ Senator the Hon Robert Hill, “Australia — Japan defence relationship”, media release, Canberra, 29 September 2003, in Brendan Taylor, *Australia as an Asia — Pacific Regional Power: Friendship in Flux?*,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52.

⑨ David Walton, “Australia and Japa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James Cotton and John Ravenhill, *Trading on Alliance Security — 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2001 — 200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1.

保护。^① 英国也加入其中,这一合作不由使人联想到英日同盟的年代。^② 三是积极推进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2002年,美日澳三方安全对话启动,并一直保持在副部长一级。2006年3月,美日澳三方安全对话升至外长一级,形成华盛顿—堪培拉—东京太平洋轴心。^③ 四是加强联合军事演习。日澳积极参加亚太地区多国联合演习。2003年9月,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和法国在珊瑚海进行“保护太平洋”的联合演习。五是互相提高对方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2004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中首次明确提出“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推进与澳之间的防卫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与信赖”。^④ 2005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访日,发表“在亚洲,澳大利亚再没有比日本更好的朋友了”的演讲。^⑤ 这些明确表明双方在各自战略中的重要性。日澳安全合作的迅速启动促进其向机制化、法制化发展。

1.6 日澳同盟关系

21世纪,日澳迅速发展的安全关系不断升级,由伙伴走向同盟。2007年3月,日澳签署《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标志着日澳“准同盟”的安全关系的建立,^⑥确立了日澳同盟关系的基调。“联合声明”强调双方与美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和同盟关系,规定双方在军事演习和训练,交换战略情报,应对传统威胁、非传统威胁,维和行动、海上与空中安全、人道主义、灾害救助等领域的合作,加强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框架内的合作,强化外长、防长之间一年一次的战略对话,确立了2+2(外长+防长)定期会晤机制。^⑦ 2008年12月,日澳在2+2(外长+防长)会晤中,签署《军事防卫合作协定》,加强双方舰队支援,秘密情报保护等,其中规定日本自卫队进入大洋洲海域从事海上安保等活动时,澳大利亚有提供情报与后勤保障供应的责任与义务。^⑧ 这意味着日澳基本同盟关系的确立。2009年12月,日澳两国首脑一致同意为缔结有关日本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相互支援条约而展开政府间磋商。^⑨ 今后,日澳正在从各个角度夯实双边同盟架构,扩展合作范围,实现双方安

全力量的整合,紧密配合盟主美国。

二、日澳安全关系的特点

从日澳安全关系范式的演变来看,日澳安全关系明显受到世界格局、地缘政治、大国因素的影响。结盟状态、外力作用、地缘政治色彩形成了日澳安全关系的显著特点。

2.1 囿于“结盟怪圈”的状态

从日澳安全关系100多年的演变状态来看,绝大多数时间处于盟约状态,“日澳已经有70多年的间接盟友关系”。^⑩ 20世纪初的日英同盟,澳大利亚以英国的附属角色成为日本的间接盟友。“二战”后,日澳成为美国主导下的冷战间接盟友。直至2008年日澳结盟,日澳从间接盟友走向同盟。这种盟约土壤和结盟情结影响了日澳安全关系的视野,使其最终没能走

① Brendan Taylor, Desmond Ball “Australia - Japan”, in Brendan Taylor, *Australia as an Asia - Pacific regional Power: Friendships in Flux?* Abingdon, Ox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53.

② Naoko Sajima “Japan Security Perceptions of Australia”, in Brad Williams and Andrew Newman, *Japan, Australia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57.

③ Purnendra Jain, John Bruni “American acolytes: Tokyo, Canberra and Washington’s emerging ‘Pacific Axis’”, in Brad Williams and Andrew Newman, *Japan, Australia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89.

④ [日本] 防卫厅编《防卫白皮书》,2004年,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4/2004/index.html.

⑤ The Hon John Howard MP, “Transcript of the Prime Minister the Hon John Howard Mp address to the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Australia in the World’ ”, <http://au.chineseembassy.org/eng/xw/t190220.htm>.

⑥ [日]川上高司《日本战略》,东京财团研究报告书,2007年6月,第24页, <http://www.tkfd.or.jp/adm in/file/pdf/labres/24.pdf>. 转引王海滨,“从日澳‘安保关系’透视日本安全战略新动向”,《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第39页。又见“日澳建立准军事同盟意在压制中国”,人民网,2007年3月20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7/52987/5489754.html>.

⑦ [日本] 外务省编《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visit/0703_ks.html.

⑧ [日本] 外务省编《日澳外长、防长第二次会谈共同声明》,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2plus2/0812_ks.html.

⑨ [日本] 外务省编《日澳首脑会谈概要》,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visit/0912_sk.html.

⑩ H. P. Fei (trans. Toshiki Gom), “Indirect alliance in the Pacific Rim: Japan - Australia Relationship under the Pax Britannica and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8, 1981, no. 2.

出同盟的怪圈。当日澳津津乐道同盟带来的巨大实惠时,却忽视了其背负的无形重荷。这种同盟架构是一把双刃剑,对其安全关系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当一国与另一国结盟或合作时,其利益关系很可能会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其与它国更接近。^①在英国主导下的日澳间接盟友关系上,澳大利亚在“白澳政策”上做了妥协和让步,而日本也需承担保护澳大利亚的责任。在美国的主导下,澳大利亚无奈与日软和平,削弱日本的意图化为泡影。日本也在低姿态中遭受澳大利亚的冷遇和歧视性政策。在美日澳三边同盟架构下,日澳安全关系被定位在从属的二流地位,难以施展拳脚。在日澳同盟下,双方进行利益互换,渲染中国威胁论,以邻为壑,角逐亚洲的话语权。然而,这种寻求遏制和对抗的过时思维,在相互依存的时代,注定其必将以丢失更多的权利为代价。而且,结盟本身暗含着威慑和不友善的意味。国家之所以寻求建立联盟,首要在于通过与他国的联合增加他们的实力,从而有助于威慑潜在的侵略者、避免不必要的战争。^②正如乔治·里斯卡所观察到的“联盟是为了反对某人或某事,而且仅仅为此而生。”^③日澳结盟的安全模式容易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不利于日澳安全关系影响力的辐射。

2.2 源于外力促内生的模式

从日澳安全关系的形成模式来看属于外因促内生型。外部因素使处于太平洋南北的日澳拉近了距离。在外力作用下,日澳演绎了防范、敌对、仇恨、和解、伙伴、同盟的安全关系。20世纪初,在英日同盟下派生出日澳防卫与防范的安全关系。“二战”中,在与美国联盟抵抗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中,衍生出日澳敌对关系。战后,在分别与美国的结盟中催生了日澳间接盟友关系。21世纪初,在美国的默许、主导和日澳的一致意愿下,共生出日澳军事同盟关系。英国因素、美国因素在日澳安全关系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那些有共同盟友而本身没有成为盟友的国家,比那些面对一个共同敌人

而未能团结起来的国家,更有可能使系统失衡。^④“日不落帝国”英国为了维持其日渐衰落的世界霸主地位,将同盟合作的角色选定日本,可谓一箭双雕,既稳固在远东和亚太地区的霸权,又借日本的力量保护其势力范围。相较于英国因素,美国因素的外力作用更明显。为了维护全球霸权系统,促成亚太战略的成功部署与推进,美国自然希望日澳结盟,扮演好系统中的角色,成为其遥控亚太格局的南北锚。外生性的特点,使日澳安全关系有较大的空间跨度,从欧洲到美洲、太平洋和亚洲。然而,也正是这种外生性,注定了日澳安全关系自始至终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缺乏生命力,因而随着外部因素的分解而破解。从目前来看,虽然日澳安全关系有内生性的经济利益驱动,但一直以来的英国、美国因素促进了日澳双方的近距离接触。尽管日澳政治上的和解与政治关系的成熟促进了双边安全合作的启动,但若没有美国的默许,日澳安全合作的进展还尚需时日。目前,日澳已确定双边安全合作框架,确立2+2(外长+防长)磋商合作机制,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2.3 基于浓厚的地缘政治思维

从日澳安全关系产生的战略考虑来看,地缘政治思维贯穿其始终。在英日同盟下,日澳安全关系被置于以遏制俄国和德国的扩张来保卫其本土安全的地缘政治考虑中。日本在日俄战争结束之际处于财力枯竭边缘的情况,使得英日同盟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⑤“二战”期间,日澳敌对关系是源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同盟的对决。战后,日澳加入以美国为首的

① [美] 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杨少华、官志雄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54页。

② [美] 迈克尔·巴尼特“中东的认同与联盟”, [美] 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宋伟、刘铁娃译《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页。

③ 同①,第254页。

④ 同①,第255页。

⑤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西方阵营,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南北锚,日澳安全关系被置于共同遏制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共产主义威胁的美国战略布局之中。如果说在此前,日澳安全关系大多数时间是被动陷入大国设置的地缘战略格局之中,那么21世纪日澳已开始主动构建基于地缘政治的双边安全关系。日本以海洋国家自居,崇信海洋国家应与海洋国家结盟,以对抗陆地国家,遏制中国和俄罗斯。被亨廷顿冠以“无所适从的国家”之名的澳大利亚,^①奉行结盟方式,以澳美、澳日联盟形成保卫本土的天然屏障,防止可能来自亚洲的危险逼近。日澳结盟可谓一拍即合,仍不能摆脱过时的地缘政治思维。尽管,日澳一再强调不针对中国,而在两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又大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其围堵中国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而且,将来的地缘政治趋势将会导致日澳安全关系的进一步加强。^②

三、日澳安全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

日澳双方拥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相似的地缘身份认同,在实现大国国家定位,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围堵遏制中国,攫取亚太权力,提升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这虽有助于推进双边安全合作的深化,但日澳双方军事实力的不均衡、美国的影响、亚太安全环境的特性等制约着双边安全关系的发展。

3.1 受代价与收益因素的制约

日澳不对等的军事资源导致的利益分配和代价计算,将会影响双方安全合作的进程。任何两个试图合作的国家,都必须考虑在他们之间如何分配收益,因为每个国家无疑都想使自己的绝对收益最大化。在绝对收益前提下,每一方关心的是自己最大化地占有利益,毫不在乎他国在交易中的得失。^③日澳双方不对等的军事资源直接关乎其之间的利益分配。澳大利亚政府宣布2009—2010财年的国防预算约为270亿澳元(约210亿美元),^④2009年日本国防预算费47028亿日元(约509亿美元)。^⑤澳大利亚皇家军队仅仅

是一支很小的力量(5.3万人)^⑥,是日本自卫队(28.6万人)^⑦的五分之一。不对等的军事力量不仅影响双边安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意味着必有一方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事实上,澳大利亚已在为参加伊拉克重建的日本自卫队提供保护期间,付出了近3亿澳元的代价,相当于2架“楔尾”空中预警控制机的费用,5架全球鹰无人飞行机的费用。^⑧毫无疑问,日澳双方希望进一步的安全合作都是在以相对低的代价基础上进行。^⑨事实上,合作方都希望以较低的代价换取更大的利益。目前,日澳已同意为缔结双边军队相互支援条约而展开政府间磋商,期间,将进行怎样的利益分配,值得拭目以待。

3.2 受美国因素的制约

日澳安全关系受美国因素的制约,日澳安全合作关系折射出浓重的美国色彩和难以抹去的美国影子。从日澳安全关系的形成过程和盟约模式来看,美国因素无处不在。从日澳安全合作的内容来看,不论是应对传统威胁,还是非传统威胁,都是美国主导的潮流。日澳安全关系在美日澳三角关系中的从属地位,注定了其亦步亦趋追随美国的角色。日澳军事结盟迎合了美国遥控亚洲格局的意愿,弥补美国在亚洲安全格局中日渐明显的力不从心。对于日澳双方来说,日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② Desmond Ball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Australia: Current Ele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Brad Williams and Andrew Newman, *Japan, Australia and Asia - Pacific Secur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80.

③ [美]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④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he Defence White Paper 2009*,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

⑤ [日]《2009年日本防务关系费》, <http://www.mod.go.jp/j/yosan/2009/kankei.pdf>.

⑥ 同④。

⑦ 罗彦军“日本自卫队之前世今生”,人民网,2005年11月27日。

⑧ Brendan Taylor, Desmond Ball “Historical overview”, in William T. Tow, Mark J. Thomson, eds., *Asia - Pacific Security: US, Australia and Japan and the New Security Triangle*, Routledge, 2007, p. 17.

⑨ 同②,第166页。

美、澳美安全关系仍是其最主要的关系,这已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日澳安全合作的空间。而且,日澳双方都会优先考虑和美国的联盟作为其战略政策和计划的基础。这意味着由美国的战略和防卫政策来决定日澳双边安全关系进一步扩展的方向、步伐和范围。^①而美国因素显然影响了这一双边安全合作关系在亚太地区的信赖度。

3.3 受亚太安全环境因素的制约

从日澳安全合作的环境来看,日澳关系面临挑战。日澳结盟的安全合作模式表现出鲜明的敌对性和排他性,以美日澳同盟体系为轴心,构建安全共同体,以此来主导亚太安全秩序,这显然与亚太安全环境相悖。亚太地区包括了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东盟地区论坛、10+3机制、东亚峰会等构成了亚太安全发展的主要架构,亚太国家都应是构建亚太安全框架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脱离亚太实际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忽视或排除中国、俄罗斯、东盟来建构亚太安全共同体,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为亚太安全环境带来安全困境,不利于亚太和谐安全环境的构建。历史表明:亚太没有为孕育美日澳三边安全共同体的运营提供丰富的土壤,美澳新关系因新西兰的反核政策而陷于瘫痪,美日韩共同体也因朝核问题和日韩的历史积怨而陷于停顿。^②安全共同体,无论是现实状况,还是未来走向,只要不能适应这些变化着的外部条件,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③

四、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

目前,日澳在积极构建双边安全关系模式,尽管在捕鲸问题上日澳存在严重分歧,但并不会成为双边安全关系发展的阻碍。今后,日澳安全关系将会置于两个安全框架中拓展空间和发挥功能,并在推动两国国家发展战略中进一步强化。

4.1 强化美日澳三角同盟

日澳安全关系在巩固美日澳三角同盟中发挥功能和求得发展。第一,维系美日澳三边安

全关系是日澳安全关系的重要职能和发展方向。如果日澳不能找到安全问题上进一步的共同基础,三边关系就不会加深。^④尽管,相较于美日、美澳安全关系,日澳安全关系处于补充和二流的地位,但日澳安全关系是美日澳三角同盟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边。日澳安全关系继续在配合美国反武器扩散、维和行动、开发反导弹系统,应对非传统威胁方面,如反恐、海盗、跨国犯罪、流行病等方面加深合作。第二,日澳安全关系中已成招牌的地缘政治色彩,有助于继续强化美日澳三角战略同盟。根据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世界的边缘地带有两个同轴的新月地带,一个是内新月形地带(或边缘新月形地带),另一个是外新月形(或海岛新月形)带。^⑤日澳作为海岛国家,是外新月形(或海岛新月形)带的一部分,与世界最强海洋国家美国有共同的地缘政治特性。这有利于缓冲美日澳三方的战略分歧,平衡美日澳三角战略利益,加强三方战略对话,减少三边主义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目前和将来的地缘政治趋势将导致美日澳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加强。^⑥

4.2 构建美日澳印四国同盟

日澳安全关系在促进美日澳印四国同盟构想付诸实践中发挥功能。一方面,日澳安全关系是构建美日澳印四边关系中重要的一边;日澳同盟是四国同盟构想框架中的重要架构和支

^① Brendan Taylor, Desmond Ball "Australia - Japan", *Australia as an Asia - Pacific regional Power: Friendships in Flux*, Edited by Brendan Taylor, Routledge, 2007, p. 57.

^② Ibid, p. 20.

^③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④ Mark J. Thomson "The power of three", in William T. Tow, Mark J. Thomson, *Asia - Pacific Security: US, Australia and Japan and the New Security Triangle*,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7, p. 67.

^⑤ [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徐小杰、张荣忠译《20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⑥ Brendan Taylor, Desmond Ball "Historical overview", in William T. Tow, Mark J. Thomson, *Asia - Pacific Security: US, Australia and Japan and the New Security Triangle*,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7, p. 16.

撑。另一方面,日澳结盟的安全关系模式,折射出一种民主国家安全共同体、集体认同、联盟规范。国家认同的变化或者革新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安全政策。^①日澳以此规范和认同来影响印度的偏好和行为,力促日印、澳印双边安全合作关系模式的建构,实现拉印结盟的意图。日印安全关系已从战略合作伙伴发展到军事同盟,并在2009年进一步升级,确定了“2+2”(副外长+副防长)定期对话机制,仅次于日澳“2+2”(外长和防长)定期对话机制。澳大利亚已加快寻求与印度安全合作的步伐。2009年,正在印度访问的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在邀请印度参加两国联合演习时强调:希望加强与印度的安全合作,并将此置于“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地位”。^②澳大利亚的急切心态溢于言表。美印安全合作已从“十年防务关系”走向核合作。而印度的安全战略也在变化,从“不结盟承诺”道路转向“多结盟”道路。^③“亚洲版北约”^④的雏形已清晰可见。

4.3 推动国家战略的实现

日澳安全关系在推进两国国家战略的实现中进一步深化和发挥作用。政治大国化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21世纪,日本加快了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日澳军事结盟是日本推进政治大国战略所尝试的一条途径,不仅增大了日本的军事威慑力,而且使日本有更大的主动性出入太平洋。同时,日澳安全合作也是日本海洋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初,随着日本右翼新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和膨胀,“海权论”开始死灰复燃,发展海洋国家战略提上日程。与海洋国家结盟带来的实惠诱使着日本再次与海洋国家澳大利亚结盟,抗衡亚洲的陆上强国中国和俄罗斯。通过发展海权形成对陆权的优势局面,日本意欲携美制亚,拉澳控亚,主导亚太安全格局。

澳大利亚作为英联邦成员国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世界更多的注目。冷战期间,澳大利亚在外交上紧密跟随美英,缺乏国家战略的自觉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崛起,澳大利

亚进行新的国家定位。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提出“中等强国”国家战略发展目标。澳大利亚定位的“中等强国”不仅与法国、中国等国家并列在一起,而且还与德国、印度和日本并列,是仅次于超级大国的政治大国。21世纪初,澳大利亚经济实力的增长,不仅使澳大利亚的自信心得到极大的膨胀,而且促进其向大国目标冲刺。日澳军事结盟不仅是澳大利亚步入大国行列的重要依托,也是澳大利亚参与亚洲事务、融入亚洲的重要平台。通过深化日澳安全关系,澳大利亚可以借此强行参与到亚洲安全事务中,谋取更多的安全利益,扩大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权利。

五、结论

日澳安全关系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演绎了防范、敌对、仇恨、和解、伙伴、同盟的安全关系范式。基于追求共同的利益,日澳由敌对走向合作,由敌人走向同盟。这正应验了帕默斯顿所宣称的“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我们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才是我们的终生所求。”^⑤日澳同盟为亚洲一体化的实现设置了障碍,给亚太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投下一片阴影。

① [美]罗纳德·杰普森、亚历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坦“规范、认同和国家安全文化”, [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宋伟、刘铁娃译《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② “澳大利亚邀请印度参加联合军演”,中国日报网,2009年10月14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9-10/14/content_8794071.htm.

③ 2009年11月18日,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SSI)的布莱恩·海瑞德教授认为,印度的兴趣在过去十年或者更长时间里发生了变化——从“不结盟不承诺”道路转向了对“多结盟”道路的特有战略。见“美国战略报告称印度正转变为全球性军事强国”,中国网,2009年11月22日,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9-11/22/content_18930659.htm.

④ Purnendra Jain, John Bruni, “Japa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ittle NATO or Shadow Alli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 Pacific*, Vol. 4, No. 2, August 2004, p. 283.

⑤ Joseph Frankel, *National Interest*, Macmillan, 1970, p. 18. 引自张宇燕、李增刚著《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当今,日澳渲染“中国威胁论”,充当美国在亚洲格局中的实际制衡者,围堵遏制中国。这种寻求对抗代替合作的思维,难以得到亚洲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也不可能取得太多实质性的进展。日澳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已使得两国关系充满变数,更不能保证日澳同盟对东亚其他国家形成有效威慑。

目前,美日澳努力拉印结盟,打造亚洲版北约,攫取在亚洲格局中的权利。这无疑使亚太

安全环境变幻莫测,令周边国家疑虑重重。这对于需要和平与发展环境的亚太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挑战。然而,不论日澳关系中的内部亦或是外部因素,都是以其各自国家的核心利益保障为依托的,而东亚的格局变化,也为这场博弈提供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时空场域。

责任编辑 薛迎春

Probing into the Japan – 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hip

QU Caiyun¹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security relationship existed between Japan and Australia. So far, the patterns of Japan – 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hip have witnessed experienced vicissitude of changes including the indirect allies, enemies, partners and being of the same alliance.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the importance of Japan – 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hip is increasingly standing out in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Asia – Pacific security system. At present, constructing the pattern of bilateral security relationships by Japan and Australia, not only reflects the tendency of Japan – Australia security strategy, but also triggers subtle changes of Asia – Pacific security pattern.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for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security relationship of Japan – Australia, revealing its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making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challenges it is facing and the orientation of its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Japan – 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hip; indirect fellow members of alliance; adversary relationship; alliance